

吴起的悲剧也是魏国的悲剧

□ 丁万明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吴起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是兵家代表人物，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被誉为兵家“亚圣”。吴起历任鲁、魏、楚三国，在军事上能够以少胜多，在政治上能够强魏富楚。然而吴起的一生毁誉参半，死于自己亲自主导的楚国变法，既悲壮又耐人寻味。

吴起的才能和所处的环境

从历史视角来看，吴起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是战国初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三国时的曹操称赞他“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对魏国的强大和楚国的富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吴起在魏国是以充满争议和矛盾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李克向魏文侯举荐吴起，魏文侯问这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贪而好色”，不过呢，军事才能特别突出。有多突出？连鼎鼎大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都比不了。魏文侯一听，既然军事才能突出，那就让他做将军吧。“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吴起仕途的第一站是鲁国。司马迁记载，鲁人说吴起是一个猜忌残忍的人。司马光则记载，吴起是一个残忍而且德行不好的人。魏国是吴起仕途的第二站。魏文侯重用吴起为西河守，重用的理由是吴起善用兵，而吴起在魏国期间得到的评价是廉洁不贪，为人平和，能够赢得士兵的拥戴。吴起仕途的第三站是楚国，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楚悼王对他的看法是“素闻其贤”。而楚国其他人怎么看呢？“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一方面说“贤”，一方面“怨”，看来在楚国的评价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而司马迁对吴起结局的评价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刻暴”就是刻薄、暴戾；“少恩”就是不仁厚、心太狠；“亡其軀”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原因，把命给丢了。

吴起是个奇才，给点阳光就灿烂。可惜吴起生在一个可以大显身手时代却选错了展示的舞台。他仕途的第一站置身于鲁国这个特殊的生态场中，面对一群道貌岸然而碌碌无为的群小，不由让人想到一个成语——鹤立鸡群。鹤立鸡群时首先感到不爽的一定是鸡，而最后难过的一定不

是鸡，而是鹤。鲁国那些倒吴派祭出的最重要的杀手锏是说吴起的人品不行。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人一旦被指责道德品质有问题，那就很难做人了。那么吴起究竟做过什么，被别人如此攻击呢？

据说有三件事，分别是“诛邻止谤”“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如果这三件事都确凿无疑，那吴起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但是，这三件事是不是真的呢？对于这些“鲁人”评价吴起的话，司马迁的记录是“鲁人或恶吴起曰”，《资治通鉴》的说法是“或譖之鲁侯曰”。所谓“恶”“譖”，就是说坏话、诬陷，很显然，两位史学家的倾向很明显，似乎说其中指责也许并不完全属实。

吴起的性格和弱点

吴起确实有本事，但他也确实有弱点，有自己的命门。吴起的命门就是他“刚劲自喜”的个性。

公元前385年，魏国的相国之位出现了空缺。吴起当仁不让，可是没想到结果却是贵戚商文当上了相国。吴起很不服气商文做相国，跑去质问商文：“统帅三军将士，使士卒奋不顾身，敌国不敢轻举妄动，这方面你和我谁更强？”商文说：“军事方面我不如您。”吴起再问：“治理百官，使百姓乐为所用，国库充实，治国理政你和我谁更强？”商文再答：“我比不上您。”吴起又问：“守卫西河前线，使秦国不敢东侵，韩国和赵国乖乖顺从，外交方面你和我谁更强？”商文又答：“外交工作我也不如您。”吴起咄咄逼人：“这三方面你都比不上我，凭什么你做相国而不是我？”商文回答：“你看咱们魏国，如今国君资历尚浅，大臣们还将信将疑，百姓对国君也不够信赖，在这种情势下，朝政大局托付给您合适呢，还是托付给我合适？”吴起沉默良久，他承认在这种形势下商文确实比自己更合适。

吴起找商文公开理论谁更合适做相国，很显然这是政治上不成熟之举。北宋著名诗人张耒就认为吴起与人交往，只知道坚持规范原则和律法，不会权变，而且不讲方法。商文还算大度，没有给吴起小鞋穿。而继任相国的驸马公叔痤可就比不上商文大度了。与这么一位强势有为又虎视眈眈的同事共事，公叔痤感觉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有人说，在职场，你

的优秀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公叔痤的一位仆人看出来主人所受的“伤害”，说您的这点难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个人最大的命门就是个性刚强且自负。他告诉公叔痤，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贤才，但咱们国家太小，庙小恐怕供不了菩萨，建议您把一位公主下嫁给吴起。如果吴起想留在咱们魏国，一定会欣然接受；如果他心怀二心，一定会坚辞不受。然后再邀请吴起到相府赴宴，席间您与您的公主妻子演一出戏，您让您的妻子故意找茬儿发怒发飙，而您一定要装出忍气吞声的窝囊样。吴起那么刚烈，看到您在公主面前如此被作践，他还敢答应娶公主吗？他坚决不娶公主，在魏国还能呆得下去吗？公叔痤依计而行，吴起果然一口回绝了魏武侯的提议，君臣二人由此开始离心离德。最终，吴起只能黯然离开魏国。

吴起后来在楚国总算找到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可惜，时运不佳，改革还未完成，全力支持自己的楚悼王突然病逝。那些恨死了吴起的旧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在楚悼王的灵堂前围攻吴起。吴起自知在劫难逃，趴在楚悼王尸体上不起来，旧贵族把吴起乱刀分尸，捎带脚楚悼王的遗体也被伤及。太子继位，开始秋后算账。因为根据楚国法律，残害国君的尸体属于死罪，那些手刃吴起并伤及楚悼王尸体的宗室大臣共70多家尽数被诛杀。司马迁评价吴起之死是“惨讫事楚，死后留权”。所谓“死后留权”的“权”，是说吴起在生命垂危时刻，仍然以“用兵”之权谋，赢得了最后一个回合的胜利，以同归于尽的方式让戕害自己者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用人的角度来看，吴起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吴起离魏适楚，对魏国绝对是一大损失；吴起惨死，楚国的变法戛然而止。楚国变法不彻底，这是楚国其后备强秦戏弄并最终亡于秦国的重要原因。魏国因魏文侯的贤人政治而兴，由魏文侯的后代魏武侯及魏惠王等人的不用贤、不识贤甚至送贤资敌而日趋衰败。这其中，逼吴起奔楚而楚人从此强，弃商鞅赴秦而秦国因其霸，培养孙臆而自掘坟墓……魏国兴于得人，衰于失人。

人物志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

400年来，来自威尼斯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汇“ghetto”，进入世界历史，进入英语、德语、法语诸西方语言，也进入了汉语等世界各国语言。

综合我国出版的《英华大词典》（郑易里主编），《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杜登德汉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来看，“ghetto”一词在相关语言中的释义为：城市犹太人隔离区、聚居区；城市少数族裔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聚居区。而在意大利语中，“ghetto”的原意是“铸造厂”。“铸造厂”为什么会变成“犹太人隔离区”了呢？

17世纪初，中西欧地区连年战争，许多犹太人跑到比较开放、生活比较安全的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威尼斯当局为如何对待这些犹太人展开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是将这些犹太人统统驱逐出境，另一种观点是不驱逐，但要集中居住在一指定地点，后者渐渐占了上风。1616年3月29日，当局颁布了相关法令，指定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威尼斯是一个由118个小岛组成的水城。在其西部边缘，有一个名叫“铸造厂”（ghetto）的小岛，以前在小岛上曾有过浇铸大炮的铸造厂，小岛也因此得名。铸造厂岛被指定为犹太人的聚居区。在这之前，当局动员住在那里的居民统统搬走，全城约700名犹太人全部集中居住在这个被称为“ghetto”的岛上。人们问威尼斯的犹太人住在哪里，不约而同的回答都是——ghetto，久而久之，“ghetto”就成了表示“犹太人隔离区”的同义语，进而成为表示这个意思的专有名词。威尼斯犹太人隔离区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隔离区。于是，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类似犹太人隔离区、聚居区也一律以“ghetto”名之。

由于犹太人当时没有土地拥有权，故而对于威尼斯当局

和原住民是一笔大大有利的买卖：原住房、新盖的房屋均以高价出租给犹太人。这个铸造厂岛只有一公顷面积，岛上一开始只住了700人，100年后，威尼斯的犹太人人数增加了5倍。故而威尼斯当政者又划了紧邻的两个岛当犹太人聚居区。由于人满为患，在“铸造厂岛”上，盖起了几百年前很少见的七八层高，层高低于两米的“塔楼”。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威尼斯当局对犹太人的管理、限制颇为严厉，极具歧视色彩：这个小岛只能通过设有门禁的两座小桥与外界相通，还规定早、晚放行的时间。桥上大门在放行时间之外均关闭，犹太人不准在外面过夜。除了早晚的限制外，他们在铸造厂岛外“自由活动”的时间，还要除去各种基督教的节假日。如复活节前一周，犹太人就必须乖乖地待在小岛上（因犹太人被谴责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凶手）。而外出则要戴上一顶黄帽子或佩戴黄色臂章以表明犹太人身份。看管大门监督犹太人出入、沿岛巡逻的本地基督徒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自然要铸造岛上的居民掏腰包。而当威尼斯当局急需用钱时（如打仗）也会找犹太放贷商借钱……

条件如此严苛，犹太人居然还是争先恐后地涌往水城威尼斯，因为除了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对犹太人更加凶恶：西班牙驱赶犹太人出境，欧洲有些地方则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否则就当异教徒一烧了之。而威尼斯当局则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宽容大度了许多：允许犹太人在铸造厂岛上拥有自治权，有自己的宗教、司法、慈善和娱乐机构。在威尼斯，犹太人被允许当医生、商人、放贷经营者和旧货商贩。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不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历史情况吗？

在这样的条件下，威尼斯的犹太人一直生活到18世纪

『犹太人隔离区』一词的由来

□ 金海民

末。1797年，拿破仑的大军占领威尼斯，拆毁了隔离区大门等隔离设施，宣布犹太人在威尼斯想住哪里都不成问题。威尼斯犹太人过上了很长一段宽松的日子。可是到了1943年，他们又遭遇灭顶之灾：德军进驻威尼斯之后，将当时在威尼斯的240名犹太人统统抓了起来押往集中营，绝大部分被杀害，最后只有8人能够重回威尼斯。

一个词汇，历经400年，足迹遍及全世界。像该词首先在美国开始表示“黑人聚居区”那样，这个词今后想必还会出现新的释义。以它为关键词，会带出多少历史场景啊。多么希望“ghetto”这类记录了隔离、歧视的词汇以后能消失。

环球史话



□ 游宇明

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生命的流失。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十日，湖南双峰荷叶塘（原属湘乡）人曾国华战死于安徽省三河镇。得知消息，身为长兄的曾国藩五内俱焚，他一方面痛惜曾国华的英年遭难，另一方面后悔自己一年前与曾国华发生诸多争执。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写给家中三位弟弟的信中说：“记得出门甫满一年，今日归骨而未归元（三河之战后曾国藩曾数次派人寻找曾国华遗骸，最后寻得的尸首只有躯干而无头部——作者注），可胜惨痛！七年，兄弟争辩不休。今日回思，皆芝麻细故，可胜悔恨！”同样的意思，曾国藩在早先的家书里也多有提及。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曾国藩说：“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阔，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

这里有必要讲讲曾国华（字温甫）其人。此君出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少时聪敏，字写得不错，曾国藩认为他是诸弟中天赋最高的，但他性情浮躁，读书不太用功，为此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批评他，后来他

果然科举落第，只好花钱由监生捐同知。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石达开等接连攻陷江西瑞州、临川、袁州、吉安等府，“江楚道闭，文报不通凡数月”，曾国藩所率湘军面临极大危险。受曾国藩委托，曾国华“偕道走武昌，乞师以拯兄难”。其时在武昌主持军务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胡与曾国藩为刎颈之交，好友有难，又派人求到自己门下，自然不会怠慢，他当即命曾国华、普承尧率五千人的部队，又收复瑞州。这年三月，其父曾麟书逝世，曾国华只好与哥哥一起匆匆回家奔丧。因为曾国华已出嗣给叔叔曾骥云，对生父无需守那么长的孝，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即复出，入时任浙江布政使也是其亲家李续宾的部队。李部接连攻克潜山、太湖、桐城、舒城之后，进军三河镇，目的是逼近庐州。没想到此次出师不利，曾国华、李续宾一同战死。

在家期间，曾国藩与六弟曾国华到底发生过哪些争执，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曾国藩的脾气不会太好。曾国藩在江西带

兵期间，与当地官场相处不谐。原因是湘军非经制兵，朝廷并不拨给经费，要开支得自己找门路。曾国藩想出的方法是在路口、码头添设卡收取厘金，一个地方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你拿了一块，别人得到的就会相应减少，江西官员对曾国藩意见很大，他想在当地做点什么事千难万难。咸丰七年时，他一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向朝廷说明情况之后不待批准就回了家，原因就是不想再看到江西官员那一张张拉长的驴脸。既然带着满腔抑郁回到家中，碰到不顺心的地方，自然容易失去冷静。

深深伤害了六弟，而六弟已去，无法再向他当面表达愧疚与歉意，曾国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办法是“洗心涤虑”“力挽家运”。因此，他与三个弟弟相约重建家风。“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德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德改之。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蕙两家……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写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



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从曾国藩的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将六弟之死归咎于自己没有度量而造成的兄弟不睦，却不认为将六弟带进军营有何过错。曾国藩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包括六弟在内的读书人出来做事理所当然，何况，六弟曾国华也确实具有军事才华。曾国藩曾经对别人这样说过：“使吾有生还之日，温甫力也。”这样的人，在乱世不叫他领兵打仗，恢复政权秩序，叫他干什么去呢？正因为

他觉得让六弟从军没有做错，后来，他才会再次将另外两个弟弟曾国葆、曾国荃先后引进湘军。

成大事者往往有常人不及之处，曾国藩亦是如此。在遇到人生最大的得意事时，比如封官进爵之类，他不沾沾自喜，害怕盈满则亏；在遭到重大挫折时，他反省自己的缺失，决不谄讨，却也不无限扩大，该承担的就承担，不该承担的也不故作姿态。虽为封建士大夫，但他的得意与自省中渗透的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思考。

有所思